

梁振华 著

楓 林 冷 雨



中国档案出版社

序

读振华的《枫林冷雨》，却读得热情腾腾。余光中先生写过《听听那冷雨》的散文名篇，表达的是一种恋乡思国的苦情，冷到老处，冷到炉火纯青；振华的“冷雨”表达的则是一种青春盎然的激情锐思，读之，如见一片嫩枝绿叶，挂着晶莹雨珠，青春泪花，却绽着就要启笑的神采。振华是很有才气的孩子，若像余光中那样的老前辈一样用功，也一定会成为那样的大智者的。

师生本是一种缘分。振华是中文系国家文科基地班的优材生，是保送读研的。他选择我，情辞恳切；我应承他，不胜欣喜。我在高校教学二十年了，也可称“桃李满天下”，而遇到的像振华一样具有如此才气、灵性的学生却不多。比如说，湖南教育电视台要我参与“三湘名校”栏目的策划，第一个试拍的脚本就是振华用两天时间完稿的，且其质量征服了制片人，也博得省教育厅领导和许多专家的称赞。他的感觉不知怎么那样好，那样到位。读研不到两年，他发表了学术论文六篇，散文、随笔、评论数十万字，完成了多部大型电视专题片的撰稿工作，还在中文系兼课，在校报兼做副刊编辑。他爱好广泛，书画已很有档次，足球也踢得有板有眼。他是一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精力过剩的孩子。我对他实行目标管理，严中有宽，宽中有严。他也从不掉课，从不拖欠作业，作业做得认认真真、工工整整，且时有新见。他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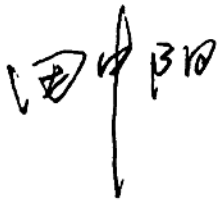
常知道该做到一个什么样子才能从我这里获得他那些宝贵的时间。

我带研究生总是强调他们既要读好有字之书,又要读好无字之书。搞人文社会科学的,要成大气候,要有大家风范,就一定要读好人生、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不要当书呆子。我给振华他们授课,基本废止那种照本宣科式的讲授,先读一批书,再设问讨论。我觉得如果“带”研究生还是采取那种缺乏双向反馈的读讲稿的授课方式,未免可笑荒唐。中国的教育亟需改革,旧的八股式教育以及五十年代照搬的前苏联的教育模式依然在我们的教育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我的这些思想得到振华他们的支持。振华的灵性依然保持着,他想象的双翼未被折损,这是我感到慰藉的。

平时交往,我与振华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怎样做人的话题。惜才之心多多,“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说,在中国的文化场中做人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读中国文学史上的华章,展现的亦是一部人才抑郁难以施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愤史,屈贾的悲歌不绝,苏辛的扼腕不止。在中国文化场中上演最多、最惨烈的悲剧就是人才被扼杀的悲剧。我希望振华他们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把我的话真正听进耳朵里,而不是仅仅为了尊重我象征性地点点头。我希望他们做国家、民族的大人才,活得堂堂正正、威威武武、潇潇洒洒、顶天立地,但一个前提是你首先必须不被扼杀。要知道,在中国文化场中一个人才的被扼杀常常是无声无息的,了无痕迹的,想流泪都没法流。因此,是“人才”,就要格外学会做人,了解“做人难”之“难”。当然,学会做人并不是要懦弱,要保守,要虚伪,要圆滑,而是要虚怀若谷,要谦逊,要大气,要高立点,要大境界。

和振华他们交往中，也常常谈到他们毕业后如何发展的话题，我总是鼓励他们再拜高师，进一步深造，不要松懈和满足。我说，湖南偏于一隅，求学成才有诸多局限性，应当到京沪那样的大地方去，投拜高师，读一个响当当的博士。在那里，把西方哲学系统地学一学，把中国的历史系统地学一学，真正通今博古，学贯中西。而我仅为山中塾师而已，时代和机缘使我定型成了这般模样。我把教训示之后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从他们的成长中，我既感到无比的欣慰，又为自己一生的命运感到难已的叹惋。

我对振华尤充满信心，这个生气勃勃、才气过人的小伙子，上苍一定会赐予他更多更好的机缘，他也一定能够把握好这些机缘而成大器之材，他的这本集子所表现的思想、品性、才情、气度使我足以相信这一点。在我想象的天宇中，一只大鹏已经扶摇凌空。



2001年4月10日于岳麓山寓所

目 录

【序】 田中阳/1

【第一辑 返观与重塑】

返观与重塑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历史流变/3

宿命与承担

——市场经济浪潮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10

时代的双重奏

——初探新时期中国文学与电影的互映互动/19

新时期中国电影“寻根”现象解析/28

余秋雨散文忧患意识论/35

【第二辑 七十年代气质】

求证人生/47

七十年代气质/51

丑陋的耻辱者/58

历史真实岂容回避

——由余秋雨拒绝“忏悔”说开去/61

“五四”精神与澳门回归/66

我仍这样说

——“马桥”断想/69

被遗忘的真实

——秋雨声的另一种解读/72

你是风儿我是沙/75

也谈文化行为的道义支点/77

直面沉重 呼唤理解

——由医疗纠纷引发的思索/79

闲话“狗尾续貂”/82

【第三辑 夜 读】

湖南文学百年兴衰溯源

——兼评《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87

- 展时代风韵 成史家之言
——《中国当代文学史》评介/98
- 平原的神话
——“羊的门”意象隐喻义浅析/100
- 永远的“台北人”
——感觉白先勇《台北人》/104
- 心灵的歌者
——品读《白天黑夜》/109
- 敞开真实的忧郁
——读《散失的海棠》/111

【第四辑 银幕情牵】

- 写在世纪的边缘
——中国电影走过 1999/115
- 文化“寻根”：湖南电视的跨世纪抉择/118
- 真爱的不朽传奇
——《泰坦尼克号》启示录/122
- 真实的力量
——观《一个都不能少》/124
- 缅怀纯真年代
——观《我的父亲母亲》随想/126
- 警世的忧患曲 民族的正气歌
——《黄河绝恋》随想/128
- 含泪的笑容
——漫谈《没事偷着乐》/130
- 庶民的节日
——兼谈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32
- 不灭的民族精魂
——观电影《国歌》偶感/134
- 俗人的把戏
——我看《没完没了》/136
- 假如迫降失败……
——《紧急迫降》断想/138

重读经典

——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观后/140

走出惘惑的森林

——《重庆森林》之批判/142

王家卫：唯美世界的感伤孤儿

——《花样年华》一瞥/146

该刮谁的痧？

——由《刮痧》引起的思索/149

虎焉卧，龙何藏？

——也谈《卧虎藏龙》/153

庭院深深深几许？

——《庭院里的女人》评弹/157

爱国者·懦夫·脊梁

——与冯小宁先生商榷/160

我们在这里相逢/164

【第五辑 岁月寻访】

火的记忆/169

三峡散记/176

歌乐山随想/180

外公/183

长者/185

寄情得意翰墨间/188

那一头的岁月/191

世说新语话寂寞/195

感悟生命/197

用一首歌的时间怀念/199

追忆似水年华/201

跨世纪怅想/203

【第六辑 血性的尊严】

2001，我们期待什么？/207

男人的骄傲/209

血性的尊严/211

我们的声音/213

世纪狂赌秀/215

我是谁? /217

为了忘却的悲哀/220

等待戈多/222

今宵酒醒何处? /224

风之韵/226

清洁的记忆

——怀念迭戈/229

轮回/231

【第七辑 足音】

夜行者的歌唱

——感觉彭燕郊/235

释然人生

——走近朱训德/241

聆听耕耘者的足音

——宁春岩印象/247

坚韧的执着 宁静的丰收

——有感于段江丽《漫漫求学路》/253

恬淡从容 气韵生动

——小记张明学其人其画/256

志存高远 苦亦甘甜

——沈友军小记/258

【第八辑 生活在别处】

唐山旧事/263

黎明前的梦魇/267

鳄鱼岛突围/270

S城寻梦/274

逍遥店/279

午夜钟点/283

【附录 渴望的黄土地】

渴望的黄土地/295

【后记】

枫林冷雨/302



返 观 与 重 塑

返观与重塑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历史流变

不管是惊喜还是迷惘，无论是坦然抑或困顿，面对世纪之交席卷而至的时代潮流，我们无计逃避。尽管种种历史转型的迹象早已在现实生活中频繁地呈现，但一旦发觉周遭的现实景观、生态环境乃至个人（包括自身）的行为方式、观念形态正全方位地经历着一场根本的变革，人们往往会生出猝不及防之叹。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让人们普遍陷入了一种衍生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疲累：唐突而急促的历史转型固然意味着创新、超越、发展的种种可能，但随之而来的，同样有传统价值体系崩溃、既有价值观念依托失落后的心理失重，以及对新世纪未知之旅的惶惑和犹疑。

历史无须避讳：二十世纪百年以降以“时代代言人”形象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商品意识无孔不入的挤压下，已由中心滑向了边缘，其生存形态普遍陷入了尴尬、落寞、困惑、焦灼之中。一位作家曾经说道：“最为重要的，就是先要弄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这是一个寻找和认识血缘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过程。”⁽¹⁾我们不妨在这种意义上来对之进行阐释：知识分子要确认应时世位的合理定位，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塑自身价值体系和存在形态，必须以对知识分子传统和精神资源的回溯与认同为前

提；而站在一个研究者和认知者的角度，进行言说也必须以对“知识分子”的这一概念的廓清和对“知识分子”历史传统的梳理为逻辑起点。

在延绵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世俗王权成为传统金字塔形话语权力结构的“塔尖”，整个社会的文化秩序都由“顶尖人物”（帝王）一手操持和控制。这样一种一元化强权至上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扼杀了多元文化并生的可能；同时，在“金字塔”结构中，由上至下，社会个体的话语权被一层层剥夺，及至底层民众，私人话语的可能性被完全取消，从而沦为二元话语的机械载体。因此，在封建王权时代，社会只存在也只容许一种声音，其他人只能充当听众和“传声筒”的角色。长此以往，代以相传，民间连对于这种专制话语的怀疑和抒发私人话语的愿望都在无形中被消解殆尽了。于是，当“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的儒学“入世”思想被专制者注入统摄社会的伦理道德传统加以推行时，便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历代读书人在“由士而仕、内圣外王”之路上前仆后继、死而后已的蔚然景观。历代社会的官僚阶层大多是功成名就的读书人，即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传统士大夫构成的权力网络铺垫而成庞大而统一的中华帝国赖以支撑的基石。在朝的士大夫身居高位，自然处于社会政治结构的中心，行使着“济国安邦”的文韬武略；与之相呼应的是，在野的儒生也同样享有一定的政治、文化特权，构成一个绅士阶层散布于民间社会，以“上格君心，下淳风俗”为己任，维持着地方的教化与秩序。而尚未入仕的读书人，“中夜四五叹，长为大国忧”，即算“不名一文”也要“心忧天下”。他们甘愿承受“十年寒窗无人问”的清贫和寂寞，只为他朝高中金榜“一举成名天下闻”。至于那些标榜“独善其身”的“出世”之士，要么是蓄势待发、静候其时（如诸葛亮）；要么是出于无奈以退隐自全，免遭不

测之祸(如陶渊明);更甚者则是借隐居之名,直取“终南捷径”(如卢藏用)。总而言之,自先秦儒学诞生以降,积极入世、勇于干预现实、主动承担天下兴亡之大任,便成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火尽薪传的价值理想和使命特征。

上文所提到的封建传统下的士大夫、儒生,是一元话语谱系的必然产物,是专制的政治体制和传统经济体制的产物,他们是一个被动的体制化群体,尚没有形成固定的、特有的话语形态。而我们惯常所谈论的“知识分子”往往指的是一个社会阶层,“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²⁾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乃是指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从事抽象符号系统创造、传播和使用的自由职业群体,包括文学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人文学者、教师、编辑记者等等”。⁽³⁾显然,这是从广义上界定知识分子的身份;此外,从狭义上来看,还存在这样一种“纯知识分子”,即我们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不为具体的职业所限制,他们以所处的社会及其文化生态为关注焦点,他们是时代精神文化的负载者和创造者,“是人类的人文精神,包括伦理精神、宗教精神、美学精神、艺术精神的立法者”。⁽⁴⁾与中国传统士大夫、儒生相比,人文知识分子存在形态的显著特质是:“他们已非知识与社会价值的垄断与独占者;他们不再与政治权力必然地连在一起;他们不再是一个明显的身份的集团……他们已不具有士大夫所有的阶级性的‘同类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最难归类的一群。”⁽⁵⁾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产生在本世纪初,确切地说产生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之后”。⁽⁶⁾伴随着一场风起云涌的现代化革命,庙堂拆毁、道统式微,一元化的强权话语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现代化”的挑战和质疑。沿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走到了穷途末路,读书人由士而仕、进居社会政

治中心和权力中心的道路被封堵,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及其价值取向在社会急速转型的年代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士大夫的旧传统已完全丧失了生命力,不足以再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基。于是,从士大夫旧传统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便贯穿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整个历史过程,生存于夹缝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精神悲剧。章太炎治国学,康有为尊儒教;“新文化”运动先驱引进西学,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心急如燎地抨击旧传统……尽管他们在学术观念、价值向度上彼此之间迥然有异,但仍然都明显的呈现出传统士大夫型心态,即“经世致用”、“济国安邦”,希望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确认识识分子的中心地位,进而用改造过后的“新道统”或全盘引进的西学传统来“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拯救民族危亡。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由于受清末民初及至二十世纪中叶异常复杂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化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强烈的务实倾向。它的几乎所有核心观念,都是针对现实的社会危机设立的”,⁽⁷⁾而这种种“核心观念”又往往以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拒绝与漠视为前提。于是,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己任的现代知识分子,空有救世之志、报国之心,却得不到施展宏图大略的机会;在意识形态冲突和权力斗争的历史漩涡中,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成为了痛苦而又焦灼的“零余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正因为这种边缘化生存状况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落差,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以鲁迅为典型)在“阵痛”中觉醒,在“彷徨”中顿悟。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在对主流意识的质疑、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对知识者边缘化生存境遇的关注中穿梭游走,从而也在自我身份确认和价值归属上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特征更加吻合。

四十年代末,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从实践中发展而

来的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销声匿迹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一元化话语结构体系镀上一层意识形态光亮后初露端倪。而且在随后的30年间，这种话语垄断倾向在接连不断的政治事件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至“文革”期间更是发展到巅峰。“文艺政治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一度成为指导文学艺术创作的纲领，成为了一代知识分子进行道德自律的准则。这一时期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明显分裂成两大阵营：鉴于政治与文艺异常紧密的联系，小部分知识分子借助于强权跃居时代前台，成为意识形态话语和权力话语的传播者、阐释者，再次回到了社会政治结构的中心。而绝大多数游离于体制之外又不为体制所认可的知识分子，出于体制的需求，成为了比劳工大众更“低等”的人，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和心态比劳工大众更为低劣，更为卑微。在这一时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顽强地活着（而且广大人民群众呼喊它的声音比任何时代都要响亮），但他们实际上扮演的是一种“缺席的出席者”的角色，彻底丧失了话语权力，并且随时随地要充当接受“思想改造”的对象。“五四”以来刚刚把孔圣先师、帝王前贤拉下神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还没有确认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角色定位之际，再一次在历史的洪流中迷失了方向。

从民族现代化的视角来回顾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进程，八十年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景观会勾起许多人的崇敬和留恋之情。那是一个刚从历史泥潭中抽身而出的年代，逃离了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她是那样的朝气蓬勃、富有生机，同时又蕴含着如此巨大的文化多元发展的可能。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蜕变的年代。悲怆的历史和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让曾经对体制长期依赖和迷恋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怀有警觉，而相对宽松的思想氛围又恰恰为多元文化选择提供了现实土壤；于是，知识分

子对主流意识集体性的疏离便成为了必然。若就同一时期的文学流变来看,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女性文学”、“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知识分子话语逐渐与意识形态话语剥离的过程同样也得到了鲜明而又深刻的诠释。

在八十年代繁盛的文化景观中,还值得特别指出来的是:随着历史反思的深入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在对民族命运无法割舍的使命感的驱动下,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回溯到“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源头,试图在西学思想文化库存中汲取“启蒙理性”。这就使得八十年代成为继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和“五四”之后的又一次规模浩大的文化引进和符号资本“原始积累”的高峰。对于八十年代的西方文化思潮蜂拥而至的景况,想必人们还记忆犹新,“它不但使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当代背景下反思和‘重写’历史和想像未来,更通过具体的话语操作和语言习得将当代中国的经验表达紧密地编织进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国际符号生产和秩序网络之中”,而与此同时,“符号资本的积累也必将在符号和话语空间的内部为自己作出日益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说明。”⁽⁸⁾如果说八十年代逐渐与体制疏远开来的知识分子是在现代化的合法旗帜下重拾启蒙主义话语的话,那么,这种拒绝边缘化宿命、重构知识分子话语谱系的努力一旦遭遇八十年代末的历史事件和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其脆弱乏力便无可避免地凸显了出来。

在九十年代席卷中国的社会大转型当中,尚未完全在疏离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的状态下获得独立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又遭遇了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强盛而勃兴的大众文化的强悍冲击,由社会文化话语体系的中心滑向边缘已是宿定的命运。在这样一种“宿命”的纠缠之下,对于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是

完全逃避还是勇敢无畏地承担？面对汹涌而至的商业化浪潮，是选择毫无保留地逢迎还是毅然决然的拒绝，抑或保持距离的理性审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业已作出了形形色色的选择。然而，正如社会转型正在进行当中一样，知识分子角色选择和自我认同的努力也并未就此终止，其生存形态的建构仍然处于探求、摸索之中。

2000年10月

注释：

- (1)张炜：《多元与宽容》，《中华读书报》，1992年2月15日。
-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3)许纪霖：《寻求意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 (4)葛红兵：《话语权力分割与人文知识分子》，《花城》，1998年第3期。
- (5)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
- (6)颜敏：《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 (7)王晓明：《太阳消失之后——谈当前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
- (8)张旭东：《重访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